

《“桃园”风云录——〈三上桃峰〉事件纪实》序

曲润海

《三上桃峰》事件过去已经三十四年了，《三上桃峰》平反也已经整整三十年了，正好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。三十年或者说三十多年，早已时过境迁，那时出生的人已经三十多岁，根本不知道“三上桃峰”事件是怎么回事。而那时的青年也已经五十岁左右，那时的中年则差不多已经都退休了，他们虽然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，但也淡忘得差不多了。重提这件事，似乎没有多少意思了。然而，历史是一面镜子，它不是哈哈镜，它总是平实地折射着事物，折射出各种人的各种面目。让后人真实地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，看到当时各种精彩的表演。使过来人反思，使后来人知道前事，得到某种启示。

《三上桃峰》是一部晋剧，最早叫《三下桃园》，是歌颂农村生产队之间的共产主义风格的，作者杨孟衡、许石青。我是1985年冬天在太原看到的。1972年12月在柳林县召开的西山地区28县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，我又看了柳林县晋剧团演出的改了名的《三上桃峰》，剧情、主题没有变。在当时百花肃杀一花独放的局面下，这个戏是很吸引人的。1974年为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，仍由杨孟衡修改，戏名沿用了《三上桃峰》。基本剧情、主题思想仍然没有变。四人帮把它打成了大毒草。罪名是：为刘少奇翻案，反对样板戏，山西更进一步加码，加上了反对学大寨。

一个普通的歌颂时代新风的戏，怎么就成了大毒草？四人帮说，这不是一出戏的问题，而是政治问题。其实四人帮要把《三上桃峰》打成大毒草才是政治阴谋。这个阴谋，首先表现在反对安定团结的方针。从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，党的干部政策逐步得到落实，一大批老干部参加了各级党委的领导班子，使各项工作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。当时，山西的形势也是好的。但是这种好的形势，却被四人帮视为“复辟”、“回潮”，因此他们要疯狂地破坏。四人帮反复逼迫谢振华同志交待“批极左，批派性，批无政府主义”的“后台”、“黑指示”，把矛头指向周总理。在追不出后台的情况下，就层层向下株连。我就被查问过在柳林有哪些人看了《三上桃峰》。我如实说，张平化、刘开基同志没有看，李顺达、朱卫华同志看了。朱卫华当时对我说，现在强调阶级斗争哩么，这个戏却说的是发扬风格，恐怕不合时宜。这样就没有再查问下去，朱卫华同志躲过了一劫。但是以谢振华为代表的一大批领导干部却躲不过去，不管他们是否与《三上桃峰》有无任何关系，都在劫难逃。与《三上桃峰》有关的王大任、李蒙、卢梦、贾克，以及杨孟衡、许石青、贺登朝等同志则更不能幸免。就是与《三上桃峰》毫无关系的赵云龙，也因一篇《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问题的一些理解》，被四人帮定为《三上桃峰》的理论基础，大批特批，赵云龙被迫害致死。

四人帮制造《三上桃峰》事件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。首先在政治上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局面，把刚刚稳定下来的山西，重新搞乱；它对广大干部，特别是老干部，是又一次严重的摧残，致使好多重新进入领导班子的老

同志无法工作。在思想上，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，严重地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，许多违反政策的现象得不到纠正，甚至愈演愈烈。学大寨的紧箍咒箍得更紧，西山地区会议等于白开，以西沟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农业先进典型被打入“反大寨”的行列。把刚刚有了一点松动的文艺，又打得万马齐喑，把文艺工作紧紧地绑在与“正在走的走资派”斗争的战车上，在山西，则逼进了文艺学大寨的死胡同。广大文艺工作者又戴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，再难进行艺术创作，更不能开展理论研究。领导不敢看戏，作者不敢写戏，成了人人自危的“文字狱”。

这种贻害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清查。被四人帮迫害的杨孟衡等竟被“划大线、切西瓜”划切到“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”一边，划切到“反大寨”的一边，在文艺队伍中划切过去一个不小的数字。后来在霍士廉、罗贵波同志主持下，巧立了一个名目，叫做“清查善终”，意思是，清查在于查清。查清了是四人帮，是成绩，查清了不是四人帮，也是成绩，才解脱了一大批被错误清查的人。并且组织了以朱卫华同志牵头的“关于几个人问题”的小组。我是工作人员之一，参与了对谢振华、曹中南、李顺达、王体、王银娥、曹西康、武天明、赵鉴等一批在“批谢”中被批干部的平反调查，通过省委常委会，作出了正确的结论。

对于《三上桃峰》的平反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。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段时间的省委领导人，抱着一个“不要忙，要等等形势，看看形势”，“不要急，也不要抢先”的态度，迟迟不敢动，结果弄得很被动。1978年春节，文化部在昔阳召开全国群众文化工作会议。会议期间，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吴雪说，《三上桃峰》应该平反。

《三上桃峰》事件的受害者卢梦和省文化局副局长邓焰，也在会上。会后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在宣传部会上几次不指名地指责卢梦、邓焰同志，为什么不表态，为什么不顶他几句？实际上是批评卢梦同志。卢梦同志不久就调北京去了，离开了他工作了几十年的第二故乡，而没有等到山西给他平反。直到1978年6月下旬，在昔阳看到一个材料，其中说了《三上桃峰》事件与刘少奇无关，这才准备平反。给《三上桃峰》平反的工作中，我是一些文件、讲话、山西日报“本报记者”的文章的起草者。但平反并不彻底，也不够全面。在给中央的报告中，又点了谢振华同志的名，说什么《三上桃峰》的平反，“不影响谢振华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”。岂有给一个事件平反，却不给最主要的受害者平反的道理！这句话我起草的时候并没有，是后来加上去的，连宣传部的副部长也不一定都知道。

在整个《三上桃峰》前前后后的过程中，我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。我是最早看过《三下桃园》的，当时还看了上党梆子《山村供销员》。和我一起看的是武正国。我们觉得这两个戏都好，商量写两篇评论文章，他写了《三下桃园》，我写了《山村供销员》，都发表在《太原晚报》上。因为武正国不是文艺圈内的人，没有人注意他，他躲过了一劫。1974年《三上桃峰》被打成大毒草的时候，我正在省委派驻襄汾县的工作队，在传达了省委关于《三上桃峰》问题的通知后，要表态。我是沾文艺边的，自然得重点发言批判。这还罢了。1976年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时候，山西日报召开座谈会，邀请文艺界名人参加，我当时在宣传部文艺处，宣传部派我去参加，也发了言歌颂大好形势。会后要求把发言整理出来送去。待到见报的时候，编辑同志给加了个标题：《不准给〈三上桃峰〉翻案》。没有想到，后来给《三上桃峰》平反的时候，却又让我起草文件。尽管如此，也不能修改

过去批《三上桃峰》的历史。也没有想到，所有《三上桃峰》受害的领导者，都仍然信任我，至于杨孟衡则成了好朋友。唯一一位受害者李旦初（柳林版《三上桃峰》的修改执笔者），由于我起草文件时依据的调查材料中没有提及，因此被漏掉了，只能在30年后向他道歉了。

《三上桃峰》发生在“文革”期间，“文革”早已被彻底否定了。那么，重提这一事件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吗？我以为还是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的。

首先，“文革”仍然应该继续否定，文艺可以反映“文革”，而不应该回避。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“文革”不能写。那么一场空前的浩劫，造成那么大的破坏，文艺受到那么大的摧残，从文艺的角度反映一下，有什么不可？“伤痕文学”、“伤痕戏剧”曾经在否定“文革”中起过独特的作用，在文学史、戏剧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，不但不应抹杀、淡化，而且应该继续坚持这种现实主义的传统。

其次，不应把文艺简单地等同于政治，不应把文艺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对待，简单地比附、索隐，无限上纲。《三上桃峰》被打成大毒草的罪名之一是，抓住“桃园”二字，判定是为刘少奇树碑立传、翻案的。现在刘少奇同志早已平反，恢复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誉，也仍然看不出《三上桃峰》与他有什么联系，《三上桃峰》仍然只是一个戏。但是我们现在看待文艺作品，往往还是“政治标准第一”，或者牵强附会，或者对号入座，把文艺创作中的得失、创作思想的不同，说成政治的分野，使得创作者哭笑不得，莫衷一是。

再次，文艺有自己的品格、功能。不应该要求文艺直截了当地充当政治的“传声筒”。文艺是一张脸面，但不应该事事要文艺粉墨登场，简单地为政策、政绩、地方名片直接服务。“文革”中山西的“文艺学大寨”，把大寨当作“继续革命的典型”，当作政治标本来宣扬，当然行不通。也不能再像大跃进那样“放卫星”，那只能赶制废品，或赶浪头赶上泡沫。现在盛行的工程戏、政绩戏、名片戏，大制作、大队伍、大投资，如果当作一台晚会看，未尝不可，要想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，恐怕就难了。我们不能再搞文艺大跃进了！

最后，从《三上桃峰》的前前后后，从杨孟衡同志身上，看出一个正派的文艺工作者精神的可贵。《三上桃峰》被打成大毒草，杨孟衡没有惊慌失措，既没有推卸责任，又没有无罪认罪，过后也没有反复奔走喊冤，平反以后也只是要求退回自己的日记、笔记。但是他对平反的名单里没有李旦初却一直鸣不平。他始终专心致志地工作，在他离休之后仍然坐着冷板凳做他的学问。他撰写出一部上百万字的关于上党地区迎神赛社的专著《乐户与乐艺》，又撰写和汇集成本书，也是近五十万字的大部头。因为这是历史性的记载，书中涉及到的人物、语言，也都是从他的地位、角度写的或收集的，不作文饰，不为尊者讳。这正是杨孟衡的可贵之处。

2009

年2月5日写于北京